

主持人语

在 20 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populism）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几度兴衰，影响深远。新世纪以来，拉美许多国家的左派政党和政治领导人以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竞选上台执政，更是掀起了一股雄壮的“粉色浪潮”。

国际学术界对于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民主化理论等视角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我国拉美学界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此也有不少论述，发表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后，民粹主义不仅在拉美有了新发展，在欧洲、美国甚至亚太、非洲等地也开始蔓延，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再度升温。然而，由于学科、视角等因素的差异，拉美民粹主义的概念含义、实质与特征、历史地位等问题依然众说纷纭，国内学界甚至对于应称之为“民粹主义”还是“民众主义”都未达成一致。对于这样一个理论性强、难度较大的问题，通过学术研讨，交换、分享各自的研究心得，推动研究的深入，是本次工作坊的目标。

会议共邀请 9 位学者做主题发言。三位学者从宏观和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拉美和欧洲民粹主义的根源；20 世纪拉美民粹主义与 19 世纪俄国、美国民粹主义的不同；当代拉美与美国民粹主义的异同。他们认为，当前拉美与欧洲的民粹主义与主流政党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情绪、

示范效应、反全球化的情感直接相关。民粹主义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现象，但由于时代的变化、领导阶级和政治目标的不同，拉美的民粹主义和俄国、美国的民粹主义相去甚远。21 世纪拉美的左派民粹主义与美国的民粹主义在强度、价值取向上也各不相同，这与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和政治制度相关。此外，多位学者还分析了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民粹主义。与会人员还围绕民粹主义的概念含义、民粹主义与民主、民粹主义的生命力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本次研讨会吸引了许多校内外学者和学生参加，对于进一步推动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以及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董经胜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博雅工作坊”第 16 工作间

拉美左派民粹主义：特征与实质

2018 年 12 月 22 日

本期博雅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牵头，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在致辞中表示，博雅工作坊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之一，旨在就某一区域国别研究问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从而为更加透彻地理解相关问题及学术研究提供更多智慧成果。Populism 现在大多被翻译成民粹主义，个人认为不太合适，因为这个词的本意是民众主义的问题。民粹主义在中文的语境中带有一些负面的意义，而在英文中 Populism 并不带有特定的好与坏色彩，希望今天各位专家能就拉美的民粹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董经胜的发言题目是《民粹主义的根源：拉美与欧洲》。他表示，每个人对民粹主义的含义都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因为民粹主义可用来指称很多不同的政治现象。法国强调排外的右翼政党，或者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可称为民粹主义，但如果要进行比较研究，就需要有一个大家认可的概念，确定概念后才能准确地抓住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观念的角度界定民粹主义，将它视作一种话语体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依据这种理解，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包含着某种

形式的诉诸于人民、指责批判社会精英。民粹主义总是涉及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和对普通民众的取悦，认为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分成“纯净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两大同质且对立的阵营，政治应该是民众的普遍愿望的一种表达，由此形成了民粹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人民、精英、普遍愿望。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具有空心化的特点，它不同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缺少一种核心的价值，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又可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21世纪欧洲右翼的民粹主义往往依附于民族主义，拉美左派的民粹主义往往依附于社会主义。

如果从普遍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角度理解民粹主义，那么世界上相当部分的人都存在这种民粹主义的观念，认为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不诚实的，而且在幕后存在腐败交易。他们认为应该由人民做出最重要的决定，而不是把主权交给政客。但这样一种民粹主义往往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在条件合适时才会被激发出来，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主流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上的趋同。当代西方国家主流政治力量立场逐渐向中间靠拢，主张维持现状，对于一些选民关注的社会问题有意识地回避，这样就为一些新型的政党产生创造了条件。比如因环境问题产生的绿党，因移民问题产生的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新型政党攻击现行体制，对传统政党回避的问题往往提出一些非常激进的解决方案。

二是对政治阶层和经济形势日益增长的不满，导致民粹主义者的出现。他们提出克服危机的解决方案，因而民粹主义往往与经济困难相伴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有可能被民

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与民粹主义的联系在欧洲一般表现为“现代化的失败者理论”，认为欧洲经济的自由化和福利国家的退却带来了大量现代化失败者。而对拉美分析更多的不是基于现代化的失败者，而是强调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由此导致传统的阶级划分的模糊。经济结构转型对现有的政党体系提出挑战，传统的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表达和动员民众反抗现行体制的理想方式。对于社会不满导致的民粹主义不仅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和政治危机有关。虽然拉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恢复了基本的民主制度，但拉美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政治发展方面大多表现不佳，为民粹主义的领袖和政党产生创造了条件。

三是民粹主义带有示范效应，被看作是一种带有传染性的现象。从大众心理学角度看，有的国家可以从别国的经验中获取行动指南。学术界认为当代拉美出现了两次民主化浪潮，一次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另一次是 21 世纪的激进左派的民粹主义。一波又一波的浪潮表明它有一种相互影响的示范效应。此外，大众媒体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这种示范效应，民众获取的信息更加丰富，独立思考、自我意识更强，不再接受传统精英集团的控制，对执政集团的错误持批评立场。

最后，民粹主义带有反全球化情感。民粹主义者通常倾向于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构建“我们”“人民”的概念，他从一个封闭的边界和具有共同历史的人群当中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因此一般来说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是民粹主义

的死对头。民粹主义通常基于“纯洁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二者对立的区分，在区分“我们”和“他者”的过程中，民粹主义者通常把全球机构或是外国势力作为他者，认为这些外国势力是当代民主制最大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对外国势力的指责可以看作对现实问题的简单化，因此民粹主义往往求助于盲目爱国的沙文主义情感，提出一种颠覆理论。对全球因素的批评在当代欧洲的民粹主义中表现非常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盟的精英主义本质，因而民粹主义能够发掘一种反对建制的情感，他们反对把民主国家的权力交给欧盟总部，因为这意味着对人民主权的侵犯。当代拉美民粹主义虽然是左派，但对外部势力的批判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包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行为体发起攻击，认为它们将经济政策强加于拉美国家，不仅违背人民的意愿而且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推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

应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上述几个因素，但并不是具备了这些因素就必然会导致民粹主义，而是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不少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上述条件只是民粹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

南开大学拉美中心韩琦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拉美的社会转型与民众主义》，他认为，拉美的民众主义是伴随拉美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政治现象。不宜将拉美民众主义概念泛化为“民粹主义”。

韩琦指出，曾在俄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拉美的“民众主义”首先在时代背景上存在差异。前者产

生于 19 世纪末期，后者出现于 20 世纪上半期。时间不同意味着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也不同，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美曾经依赖的初级产品发展模式无法继续，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推翻寡头以改变现有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团结农民、工人等阶级力量，如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偏向于城市工人，墨西哥则包括农民。

其次，领导阶级不同。拉美的领导阶级是新兴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俄国的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倡导，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实际上是 19 世纪后期农场主反对大资产阶级对金融和土地垄断的农民运动。

第三，二者的政治目标不同。俄国的民粹主义主张到农民中去，依靠农民和传统村舍实现社会主义，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主张政府应管理货币政策、铁路和交通运输，同时反对土地垄断。拉美民众主义的主张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是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对外反对外国资本，要实现国有化，同时要求开放政治，动员劳工参加，依靠劳工和农民发展民族经济，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另外，拉美民众主义还主张改善民众的福利，反对传统主义寡头和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国家参与和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进一步的工业化。

最后，二者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俄国民粹主义是空想，最后没什么结果，美国人民党运动最后也失败了。但拉美不同，拉美的民众主义运动经过改革后使国家发展模式发生了转变，资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从 20 世纪初的巴特列改革，到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巴西瓦加斯改革及阿根廷庇隆

主义，都使相关国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实现了社会转型。

综上，拉美民众主义在社会转型中始终发挥着作用，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具有进步意义。此外，由于不同时期的民众主义也存在差别，在对拉美民众主义进行研究时，要兼顾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分别比较。如果只比较共同点，缺少在具体的历史时间地点等条件下的分析，容易将相关概念简单化、抽象化，从而导致概念政治化，这也是将民粹主义和民众主义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张宝宇围绕《简说民粹主义在巴西的实践》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巴西处于社会转型期，新生阶级的出现与新要求的提出是民粹主义生成的沃土。民粹主义在巴西是实践呈现出连续性特征，几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均被本国专家定性为民粹主义政策。

民粹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历史普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巴西的现代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而在1930年到1964年发生军事政变的30多年间，巴西经历的多届政府都被学者认为伴有民粹主义政治。

有巴西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控制或操纵民众的具体方法，是人民表达不满的方式，也是统治集团的权力组织形式和在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崛起的政治表达形式。也有观点指出，民粹主义是政治行为，是一种政治风格或一项政治方针，国家以此在经济领域和政治发展方面将不同的社会阶级团结起来，以实现他们的利益。还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国家政策，国家借此满足人民紧急、直接、切身的

需要，目的是要推动城市阶层特别是中下层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克里斯马式人物和权威人士组织、控制这些阶层。

民粹主义应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种是群众要求的自下而上形成的民粹主义，比如历史上俄国的民粹主义以及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他们不是由某些人组织或领导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另一种是国家政权统治人民的形式或政策，比如庇隆主义就是一种政策。目前来看，拉美民粹主义两种形式都存在。

巴西的民粹主义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30年至1945年是民粹主义生根发芽的时期，1945年至1960年是发展时期，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军人以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终止了民粹主义，巴西历史上第一波民粹主义由此结束。1985年再民主化后，萨尔内等几届政府都没有被视为民粹主义政府。进入新世纪后，卢拉政府及罗塞芙政府都呈现出鲜明的左派民粹主义特点，而最新当选的博索纳罗则被学术界公认为极右民粹主义的代表，将对拉美的民主化构成严重威胁。巴西由此进入了第二次民粹主义时期。

巴西的民粹主义于20世纪30年代生根发芽，但实际上在20年代，巴西传统社会就已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出现了一些民粹主义的端倪。一是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开始出现，同时很多欧洲留学的巴西学生归国带来了先进思想，推动巴西社会出现很多新观念和要求。二是这个时期巴西出现了很多像瓦加斯之类的克里斯马式人物，他们陆续走上政治舞台。此外，由于工业的发展，很多农民向

城市移民，导致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巴西重要的政治舞台。

巴西民粹主义的代表有瓦加斯、库比契克、巴特罗斯等。瓦加斯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通过设置机构、建立制度满足劳工大众的利益要求。他还利用民众为自己的政治目服务，比如发起“我们想要他继续当总统”运动为个人造势，组织“石油公司运动”推动组建巴西石油公司。库比契克的民粹主义表现为重视经济发展，他在执政期间推行了包括基础工业、汽车造船在内的 31 个项目的发展计划，推动建设新首都巴西维亚，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巴特罗斯虽在任不到一年，但被认为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他在竞选时提出会将一切贪腐现象从政府中除净，还举着一把笤帚作为其个人象征，经常发表一些鼓动民心的讲话。

巴西民粹主义的特点包括：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策略没有理论支持；民粹主义的发起以城市为开端；克里斯马式人物借助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周志伟的发言题目是《从巴西劳工党的兴衰看民众诉求的变化及政策转型的失败》。

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潮或政治理念，它关注的是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一些问题，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众主义能够在拉丁美洲得以发展具有必然性。首先从社会体系看，即便过去 10 年拉美经济处于发展相对较好的阶段，其社会阶层仍以中下阶层为主，民众的核心诉求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仍聚焦民生、民权。其次，拉美经济对外依赖性非常强，其

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同周期变化。当全球经济步入衰退期时，拉美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会爆发，民众的愿望会随之变化，执政党必须贴近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才能稳固政权。可以预测，未来民众主义在拉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巴西劳工党是分析巴西民众主义的典型案例。劳工党于1980年建党，当时巴西处于军政府执政时期，权利受到保障是老百姓的核心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卢拉等劳工党建党人从维护民众的政治福利、反对精英寡头入手，通过一系列工人运动，将劳工党发展成为巴西国内最核心的政党。当时巴西仍处于党禁非常严格的阶段，劳工党能从一个不合法的政党发展成为巴西国内政治生态中的主要力量，关键因素是它找准了老百姓对于生活和权利的核心诉求。

在从崛起到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劳工党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卢拉在最开始的三次竞选中都提出要实行大规模国有化，没收全部外国资产，切断与IMF的贷款协议等非常激进的主张。但实际上，这一做法虽然能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可如果没有包括媒体在内的政治机器的运用，也是无法实现执政的。

在2003年至2016年执政期间，劳工党在社会治理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政策理念，比如全民照明计划、在公立教育中重视弱势群体等。然而，随着巴西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从之前贫困阶层占主要地位发展到中产阶级占主要地位，劳工党的政策转型却没有跟上，没有满足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愿望，同时巴西国内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腐败问题，多重因素导致劳工党最终下台。

综上所述，劳工党的崛起是拉美在经历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民众主义崛起的重要缩影。90年代中后期，劳工党的政治主张与民众的“求变”和“公平”等诉求存在较大吻合，从而成就了劳工党的执政。在经历了经济繁荣周期后，巴西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民众的主流诉求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治理效率、公共产品供给、政治参与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劳工党并未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思路，从而造成其执政基础的萎缩，进而走向衰落。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夏立安在下午阶段首先发言，他对拉美民粹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分析。

新老殖民主义造成的社会正义的缺失是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新老殖民统治者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戮，欧美殖民者在拉美发起的战争，对土地的掠夺造成了拉美社会对正义的迫切追求。某种程度上看，民粹主义在拉美不仅要解决政治参与的问题，还要解决社会正义的问题。

拉美独立后保守派长期“铁板一块”的统治，是拉美民粹主义的政治根源。1815年之前，拉丁美洲有过短暂的模仿法国或美国的宪政体制的浪潮。1848年欧洲革命后，一批参加过革命的智利学者回到拉美传播政治斗争，建立工人组织，拓宽参政议政的途径，但很快被保守派所覆盖，他们被后人视为民粹主义的一种。

天主教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拉美民粹主义的思想根源。1900年前后，天主教的社会治理学说在欧洲人反思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掀起了一波浪潮。这一学说认为天主教不是仅仅关注上帝，也关注社会问题，但关注的方式与马克

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同。解决工人苦难道路应当是使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用工人社团的直接民主方式而非政党政治代议制治理国家。这种理念后来传播到拉丁美洲，引发巨大反响，最终被大多数国家接受。

否定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思想是拉美民粹主义的另一重要思想根源。1911年，法国著名公法学家狄骥前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院进行讲座，核心内容是自由主义核心思想及拿破仑法典提出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错误的。他认为财产附有社会义务，拥有越多财产的人同时也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20世纪以来，狄骥的社会权利学说逐渐渗透到拉美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等国的宪法都先后接受了这一法律理念。天主教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解决人的问题，狄骥的社会权利学说则主要解决物的问题，这是两大思想根源的主要区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董国辉的发言题目是《阿根廷早期现代化与民粹主义》。

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根廷依靠出口大量畜牧产品和农产品，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此进入早期现代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方面，耕地面积和牧场规模扩大，形成以大地产为核心，租佃制和分成制普遍盛行的土地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资本方面，外国投资的流入和民族资本的积累，都为阿根廷经济和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劳动力方面，大量移民的流入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增长。其他推动因素还包括：良种和育种技术、肉类冷藏和加工技

术、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引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刺激了国际市场对农牧产品需求的扩大；以民族自治党为主导的寡头民主制度的确立为阿根廷营造了稳定的政治局势；以出口利益集团为核心的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牧业发展的政策。

阿根廷早期现代化首先表现在人口变化方面。1869年至1914年,阿根廷全国人口从187.75万人增长到788.52万人,城市人口占比达到53%,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快,公用事业得到发展。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激增至约158万人,成为南美洲最大的城市。阿根廷各大城市约30个有轨电车公司经营里程达1250公里,年运送乘客近4.8亿人次。此外,邮政、电报及其他城市公用事业也实现快速发展。第三,早期工业特别是与出口品联系较密切的食品加工工业快速发展,生产产值及就业人数不断创新高。第四,交通运输领域取得新突破。1918年阿根廷国内铁路里程增长至34036公里,水路运输能力也大大提升,直接导致了农业与畜牧业用地的迅速扩大,加快了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助推面向出口的商业化农牧业的发展。第五,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质量不断提高。1914年,阿根廷小学生人数增加到86.3万人,教师队伍扩大到2.5万人。阿根廷人口识字率从1869年的22.6%上升到1914年的64.1%。1910年至1914年,全国年均死亡率为17.7%,远低于拉美其他国家。第六,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1919年前6个月,阿根廷居民平均每天消费面包、肉类、牛奶、食用油等物品总价值合计0.588比索(约0.567美元)。

在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背景下，伴随早期工业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而出现的政治运动，是激进公民联盟在伊里戈延领导下依靠广大中下阶层向传统的出口寡头集团发起挑战的政治运动。阿根廷早期民粹主义由此产生。

民粹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角色。首先是上层精英集团，包括与农牧业出口部门紧密相关的大农场主、大牧场主、银行家，以及控制外国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权贵和民族自治党（保守党）。其次是中下阶层，包括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人士，多为移民或移民后代，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阿根廷民粹主义的领导者伊里戈延是“青年公民联盟”的重要组织者之一，1891年他和阿莱姆另建“激进公民联盟”。伊里戈延最初动员民众的方式是依靠所谓的革命，采用暴力方式，赢得民众较高支持率。1916年大选中，伊里戈延获得37万多张普选票，当选总统。

阿根廷早期民粹主义有两个主要阶段。在1916年赢得政权之前，伊里戈延主要是更多依靠社会政治动员争取自由投票和公正选举，期间发生多次“革命”，选举法也经历了改革。执政之后，伊里戈延将关注点放在落实具体政策方面，如支持大学教育改革，加强和发展中产阶级，推动代议制民主改革；提出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案，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采取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成立财政部、石油矿藏管理总局等部门。

阿根廷早期民粹主义本质上是UCR（“激进公民联盟”）向PAN（民族自治党）的政治权力发起挑战的一种政治策略。在政治纲领、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UCR与执政的PAN之间

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提出的“自由投票、公正选举”的主张在 PAN 的政治纲领中同样存在，UCR 反对的是将他们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政治生活方式。伊里戈延曾表示，“激进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代表各种观点的力量组合。这些观点构成民众要求的核心。为民众要求服务，促使民众要求的实现，为民众重建有威望和公正的国家是党的纲领。”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系统的民粹主义理论，伊里戈延展示给世人的是其动员民众、实现政治策略的宣传方式。阿根廷早期的民粹主义对后来产生的庇隆主义有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以厄瓜多尔为例，分析了科雷亚的民粹主义。

科雷亚是拉美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2007 年他第一次就任总统时曾说，“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受人尊敬、公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拉丁美洲正在诞生。”他宣布厄瓜多尔要推行“21 世纪社会主义”，称新自由主义的漫漫长夜应该终止了。

“公民革命”是科雷亚推行“21 世纪社会主义”提出的执政纲领和计划，其实质是要改变权力关系，以利于大多数民众。要把为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为公共和普遍利益服务的人民的国家。

“公民革命”的内容主要包括：劳动比资本更重要；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对于一个低收入的国家来说，市场机制并不是非常好的机制；厄瓜多尔“21 世纪社会主义”应重视社会公正的基本作用；之前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是方法论和原则，而非教条或预定模式，这一原则需要不断革新，结合厄瓜多尔的现实，需要人民参与其中。

“公民革命”包括“宪法革命”、“道德革命”、“生产力革命”、“社会教育和卫生革命”及“主权和拉美一体化革命”五方面的主张。“宪法革命”是要在厄瓜多尔实行真正的参与式的民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为此，厄瓜多尔先后成立了立宪大会，制定了 2008 年新宪法，进行公投并通过了新宪法，随后又对新宪法做了一些修改。“道德革命”是要开展根除腐败的斗争，使所有公务员透明执法，严惩政府败类。“生产力革命”主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高科技、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结束投机钻营，征用闲置的土地，实行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合作经济、协作经济、社区经济和家庭经济共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教育和卫生革命”是要建立医疗网络，推行普遍的医疗卫生制度；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并开展扫盲运动；推行公私组织的合作，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主权和拉美一体化革命”反对外国在厄瓜多尔建立军事基地，不再延长美国在曼塔军事基地的期限；重返欧佩克组织；不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倡议成立南方银行，加入南美洲国家联盟等拉美一体化组织等。

科雷亚的“公民革命”在各方面收获了成效：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率高于拉美平均水平，社会贫困率不断下降，社保覆盖率不断提升，外交政策重点从美国转向拉美国家。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政治上反对派依然强大，通过组

织一系列反政府抗议运动，削弱了政府的执政基础；经济方面，由于厄瓜多尔主要的出口商品石油等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大幅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明显减少，社会开支削减，公共债务增加。

厄瓜多尔“21世纪社会主义”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原则，同古典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因此它并不被视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科雷亚执政的十年间，他的一些主张仍具有进步和创新意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萍的发言题目是《玻利维亚莫拉莱斯的民粹主义》。她认为，莫拉莱斯执政后，采取了倾向于底层的社会经济政策，到目前为止，给玻利维亚社会经济带来了较好的影响。

莫拉莱斯出生于玻利维亚偏远地区的奥鲁罗省奥利诺卡一个典型的印第安人家庭。在2005年大选中，莫拉莱斯赢得了近54%的选票，成为玻利维亚和整个南美洲历史上首位印第安裔总统。此后，莫拉莱斯开始以“社群社会主义”为理念，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大力推进各项变革。

莫拉莱斯主义或玻利维亚民粹主义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新自由主义在玻利维亚陷入困境。近20年来，由玻利维亚传统政党组成的历届政府均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实行私有化甚至是跨国公司化，将国家自然资源出售给外国资本。这一经济模式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玻利维亚的贫穷落后，反而加剧了这一状况。玻利维亚贫困人口比例一度达到70%，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贫困国家之一。

其次，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政策及外部势力的干涉对民

粹主义的产生有直接影响。玻利维亚历届政府对古柯种植均采取铲除政策，但按照法律规定，古柯市场是合法的。对这一涉及底层民众生计的问题，莫拉莱斯试图与政府对话，但国家和地方政府不仅拒绝对话，还采取镇压行动。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联合国麻醉药品公约》将古柯归类为麻醉品，并且从理论上混淆视听，将古柯种植户说成贩毒分子，把古柯说成可卡因。同时美国还以打击贩毒为借口，试图对玻利维亚进行地缘政治的控制。内外双重压力为玻利维亚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动力。

莫拉莱斯政治生涯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根据玻利维亚的实际情况，以农民特别是印第安原住民为核心建立工会组织，通过组织、教育和发展基层工作等方式进行政治动员，推动工会力量和影响力不断壮大。针对工会组织各自为战的特点，莫拉莱斯还建议成立协调委员会，使不同的工会联盟形成一个总的联盟。

在社会运动不断高涨的过程中，莫拉莱斯开始考虑建立政党。他先是在工会内部竞选中建立了“反帝群众广泛阵线”，主张变革，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反对帝国主义。这一主张代表了工会联合会中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一派人的思想，用以对抗同独裁政权、寡头政治和右翼党派沆瀣一气，被莫拉莱斯称为亲帝国主义的另一派。尽管此后在全国工会联合会领导权的竞选中失败，但莫拉莱斯这一派的斗争经验却日渐丰富。此后，莫拉莱斯大力拓展工会势力范围，广泛吸纳新的基层组织，使其成为由 20 个分会组成的第一大中央工会。他先后出任“八月二日中央工会”领导人和“热带雨林工会

联合会”执行书记，并在此后与政府的斗争中带领印第安农民创建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并非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政党，也并非是由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创造的政党，而是根据玻利维亚的实际情况，以农民特别是印第安原住民为核心的工会组织建立起来的政党。他们抛弃了传统政党由党魁制定政策的逻辑，具有较强的民主性，体现在内部要实行基层选举，通过各层级选举推选出总统候选人。

争取社会主义进步党斗争目标很明确：反美反帝，保护古柯种植，把古柯作为斗争和团结的核心。他们认为古柯种植有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三层意义。古柯是玻利维亚土著人的根，是千年的农作物也是药品，不仅作为文化符号在宗教仪式上使用，也是重要的食物，象征着团结，代表着安第斯文化和认同。在莫拉莱斯看来，美国以缉毒为借口派军队和武装人员，企图镇压和消灭玻利维亚印第安文化，斗争不仅是为了捍卫古柯和土地，更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由此，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上升为国家意志。

莫拉莱斯主张在民主的框架下实行深刻变革，通过选举和和平革命的方式，推动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式民主过渡，他并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或所谓政变的方式。在 2005 年 12 月的竞选中，莫拉莱斯提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十大纲领，内容主要涉及土地权，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终结为跨国公司利益服务的行政权力，使国家机构成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提出由人民制定宪法等。

2006 年正式执政后，莫拉莱斯提出“社群社会主义”，

即玻利维亚土著印第安人拥有社群自决权，不同社群的风俗习惯都应得到尊重。他认为“社群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一种经济模式。从思想根源看，“社群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没有内在联系，其思想根植于印第安人村社中共同拥有一片土地、共同耕种土地、共同享有果实的朴素思想，具有浓厚的伦理、宗教、神学和民族主义色彩。

“社群社会主义”在莫拉莱斯执政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颁布的政策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在新宪法中赋予土著印第安人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法律地位，对自然资源进行国有化，对土地实行再分配，宣布国家有权向大地主征收部分闲置土地，并将土地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贫民和土著农民。一系列政策措施给玻利维亚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明显成效。自 2006 年莫拉莱斯执政以来，玻利维亚一直保持经济长期增长，贫困问题有所好转，底层民众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不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克里斯马式的民粹主义也面临着挑战。一是在莫拉莱斯政治生涯过程中，他主要是依靠个人魅力而不是通过完整的政党体系建设领导国家，这种模式能否持续下去有待观察。二是尽管目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在参众两院都有一定的席位，但未占多数，未来政党间的斗争将是对莫拉莱斯的重要考验。此外，社群社会主义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否消除不同社群间的分歧，达成更大的共识，也是莫拉莱斯需要面对的挑战。

综上，表面上看，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和莫拉莱斯提出

的“社群社会主义”，均有社会主义的字眼，但在内容上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没有内在联系，而是试图结合玻利维亚的国情，探寻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从本质上看，无论是莫拉莱斯崛起之初还是执政之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和“社群社会主义”仍是发生在旧有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谭道明最后一个发言，题目是《美国与拉美民粹主义的比较》。他认为，美国和拉美近年来均有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出现的趋势。美国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主流，拉美则是左翼民粹主义占主导。

葡萄牙语中民粹主义（populismo）的字面含义是“人民的主义”或“人民至上主义”，但在中文语境下有两种翻译：民粹主义和民众主义。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价值内核，人们无法从民粹主义的思潮中找出它是自由的还是平等的。它有时左有时右，有时亦左亦右，通过攀附在不同意识形态上进而呈现出不同特点。

安德鲁·杰克逊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最早的民粹主义者，但美国民粹主义的起源是指 19 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此后美国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都是右翼的。拉美最早的民粹主义者是阿根廷的伊里戈延，此后拉美经历了古典民粹主义、新自由民粹主义、新左翼民粹主义等三波浪潮，各国的民粹主义呈现出不同特点。

美国民粹主义和拉美民粹主义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在强度上，美国的民粹力量相对较弱，民粹主义总统相对鲜见；拉美则非常强大，民粹总统比较多见。在地域范围

上，美国的民粹主义较为碎片化，很难构成“浪潮”；拉美的民粹主义已形成数波较大的政治浪潮。在激进程度上，美国和拉美的民粹主义均存在与建制派不同程度的分裂，但在决裂程度上拉美较美国的程度更深，更激进。在意识形态倾向上，美国的民粹主义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主流，强调自由；拉美则是左翼民粹主义占主导，强调底层的平等。

美国和拉美民粹主义在制度基础、内在结构和政治风格三个维度上较为相似。在与民主的关系上，民粹主义是民主的伴影，是否显现出来是有条件的。如果民主是健康的，阳光剧烈了影子就没有了；如果民主有问题了，影子就出来了。民粹主义是自发的，先有民主，后有民粹，先有民粹的实践，再有民粹的理论。民粹主义不仅仅发生在民主转型的国家（拉美国家），也可以发生在民主的任何阶段（欧美自由民主国家），其内部结构是“人民”（民粹主义认为的人民）与“他者”（精英、移民等等）的对峙。政治风格方面，民粹主义有鲜明的“快感政治”色彩，它通过非常规的动员途径和更注重煽动性而非真相的事件“激活”民众。

影响美国民粹主义向右、拉美民粹主义向左的因素有四个方面。首先，美国和拉美占主导的民主观念存在一定差异。近代以来，西方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民主右翼）和民主主义传统（自由左翼）两大民主理论，前者基本原则是人民同意原则，后者是人民主权原则。两种理论虽然都主张“人民”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但对于“人民”的政治地位两者存在差异。自由主义传统指出，“人民”只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而不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和实施者；民主主义传统

则坚持“人民”不仅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和实施者。美国人的民主观立足于“人民同意”理论，基于代议制民主；拉美人的民主观服膺于“人民主权”理论，鼓吹参与式民主。

第二，美国和拉美的社会主要矛盾不一样。美国社会一直没有解决好种族矛盾问题。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表达了一种担忧，即由于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而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动摇，因此要限制移民，保护好盎格鲁-新教价值观。而拉美地区长期以来阶级冲突较为剧烈。因此，美国政坛中的各种角色无论“左右”都醉心于“身份政治”，拉美则是高举社会正义问题，反映出美国的民粹主义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拉美则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

第三，美国和拉美历史上对平等与自由议程的吸纳能力存在差异。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因受到“十月革命”的触动，通过“罗斯福新政”吸纳了左翼议程，中下层称之为体制的拥护者和受益者。而拉美自独立以来尤其是近40年来，各国的政治制度广泛地吸纳了“自由主义”的议程，解决了政权问题，但没有解决好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经济公平和社会正义问题，其左翼民粹主义还将继续存在。

最后，美国和拉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政治衰败。美国政治衰败体现在制度僵化和出现家族政治两个方面。拉美的政治衰败则体现在其制度不是僵化而是绩效不佳，以及弱国家能力导致的民主和法制不完善。此外，拉美从未摆脱庇护主义和裙带政治等家族制遗产，这其中既有殖民者的责任，也

有拉美每一代人应承担的责任。

对于左右两种民粹主义，应看到其背后的制度基础、主导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民粹主义冲击造成的后果取决于不同政治体制的牢固程度。左翼民粹主义对拉美影响更大，因为其民主体制尚不牢固。右翼民粹主义目前尚没有击穿美国的宪法体制，特朗普仍被“关”在美国制度的笼子里。但总体上看，面对民粹主义的冲击，各国都应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讨论环节中，与会专家就拉美民粹主义相关问题发表观点，进行答问。

徐世澄：populism 到底怎么翻译，现在好像讲得比较多的是民粹主义，有观点提出应该翻译成民众主义，这种译法在拉美学界被普遍接受。今天讨论的是拉美左翼的民粹主义，我认为拉美同样有右翼的民粹主义，今年巴西大选中获胜的博尔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特朗普”，他是拉美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是极右的代表，对此拉美学界应予以重视。

拉美民粹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末之前是左翼民粹主义，上世纪末到现在，尽管拉美出现“左退右进”的趋势，但大多数国家仍是左派在执政，因此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新的拉美左翼民粹主义。拉美左翼民粹主义的特点：一是都有克里斯马式的领导人物，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马杜罗，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二是主张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迎合中下层民众的诉求。三是虽然依附于社会主义，但认为政党应是多阶级的政党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四是民

粹主义的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拉美民粹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传统，发展进程具有持久性，政策实践范围大影响大，表现具有多样性，国内外学界对其认知不一样，评价也不一样，缺乏共识。

钱乘旦：民粹主义是“运动”还是“主义”？

董经胜：民粹主义既不是运动也不是主义，只是一个用来分析政党政治或政治运动的范式。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都在某种程度上取悦于“人民”，指责“精英”，认为社会分为“纯净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两大同质且对立的阵营。民粹主义是民主制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拉美表现为从寡头式民主向民众威权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强人，将大家都动员起来，扩大参与政治的人数，但他又往往破坏民主程序，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修改宪法获得连任。

谭道明：我认为 populism 应翻译成民粹主义，不应该翻译成民众主义。因为民众主义的概念只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没有看到精英的力量。精英是主导人民的，人民是被同质化的一个整体，他们在精英眼里只是乌合之众，只有精英才能把他们领导起来，而所有的民粹主义运动最后都由某个人来领导。民粹主义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人民是精粹，强调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精粹，强调精英的力量。以人民的精粹来领导人民是精粹，这是民粹主义比民众主义在概念上更合适的主要原因。拉美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民粹主义和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没有任何区别，否则他们会制造出新的概念。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对工作坊

进行总结。他指出，与会专家介绍分析的拉美民粹主义都是较为“成功的”民粹主义，从实践表现看就是将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议会选举、大众民主完全挂钩，因为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多数，民粹主义就是代表人民，代表人民投票肯定成功。这样一来逻辑就变成了民粹主义就是民主的高度体现，是民主在拉美地区的一种表达方式。但从逻辑和实际情况看，还存在很多“不成功”的民粹主义，而且数量要比“成功的”民粹主义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有机会再对“不成功”的民粹主义进行探讨，从而对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2018年12月22日于北京大学静园二院